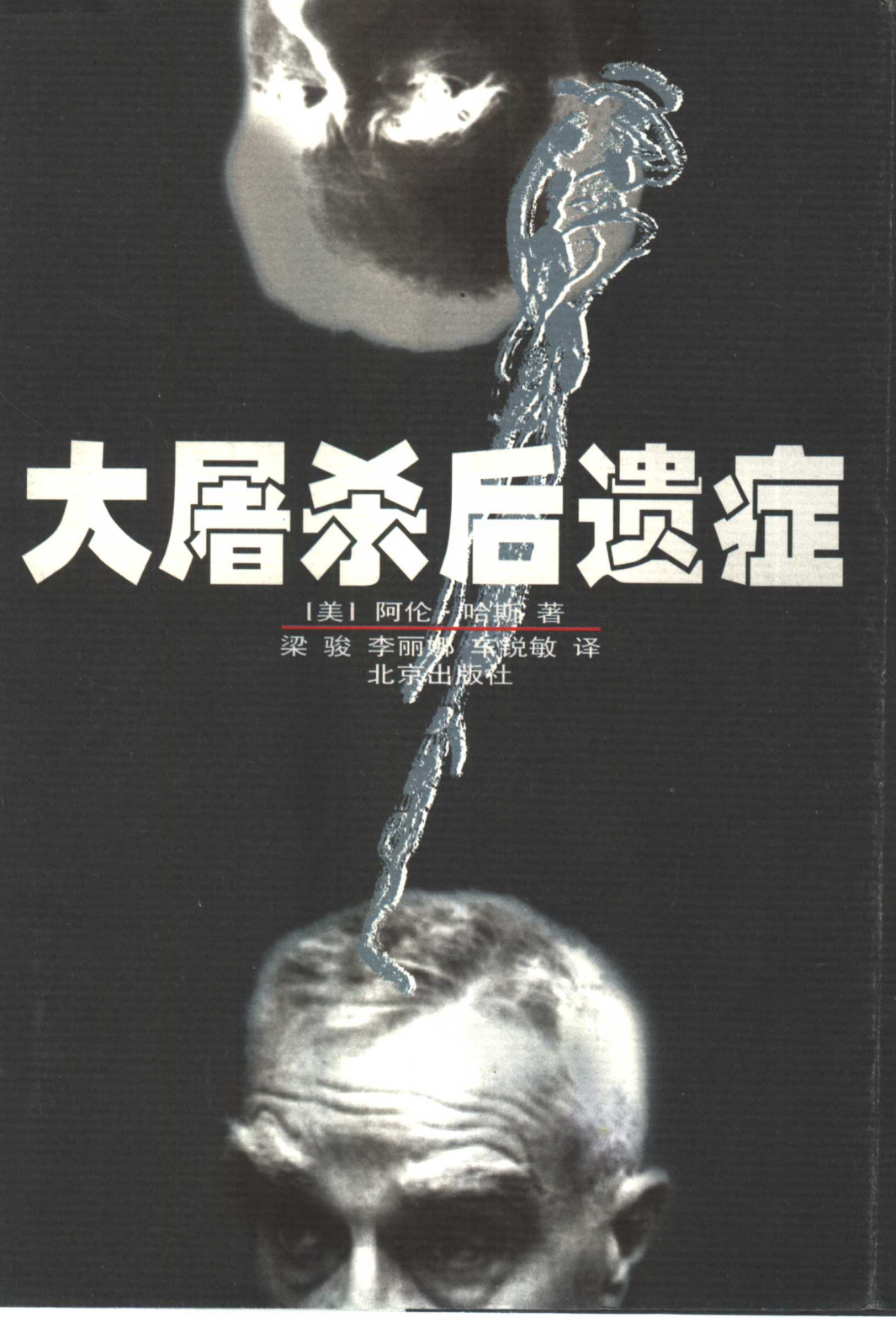




大屠杀后遗症

【美】阿伦·哈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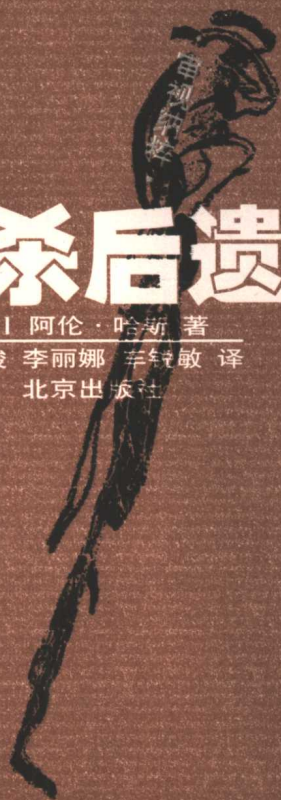
梁 骏 李丽娜 车锐敏 译
北京出版社

大屠杀后遗症

[美] 阿伦·哈斯 著

梁 骏 李丽娜 车轶敏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屠杀后遗症/ (美) 哈斯 (Hass, A.) 著; 梁骏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12

ISBN 7-200-03686-2

I. 大… II. ①哈… ②梁…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种族灭绝-犹太人-史料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0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2970 号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 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The Aftermath - Living With The Holocaust, by A Hass.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1996.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他者文库·审视纳粹

大屠杀后遗症

DATUSHA HOUYIZHENG

[美] 阿伦·哈斯 著

梁骏 李丽娜 车锐敏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82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3686-2

K·412 定价: 15.00 元

鸣 谢

非常感激威廉姆·赫尔姆赖克教授和弗洛拉贝尔·金斯勒博士在这项研究中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也感谢亚历克斯·霍尔兹曼的极大热情。我更要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表示敬意。为了其他人能够深刻了解大屠杀，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公开了自己的经历和痛苦。

——阿伦·哈斯

FC87-65 05

作者的话

二战中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有关资料保存得很完整，证实了几乎 90% 的欧洲犹太人惨遭杀害。然而，对于幸存者来说，大屠杀造成的心理冲击却延续到 1945 年以后。无辜者的遇害在幸存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当有人问一位幸存者：“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他答道：“人类从大屠杀中所学到的就是，可以杀死 600 万犹太人而无人过问。”

《大屠杀后遗症》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即如何看待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幸存者，他们是怎样抚慰心灵的创伤而继续生活。本书介绍了幸存者的生活，他们在过去或者积极抗争，或者对命运逆来顺受，而今天却在对过去行为的怀疑和思考中经受折磨。怀疑和半信半疑导致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爱恨交加。他们亲身感受到人世间的魔鬼非正义地践踏和剥夺他们的一切，无疑这是极端痛苦的经历。当大屠杀的幸存者尽力用多种方式与人友好相处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地下的冤魂在用无声的警告折磨他们。看来使人失却记忆远没有消灭人的身体来得容易。

这也是一本描述人类如何奇迹般地恢复自信的书。您将读到许多幸存者提供的一手资料，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青少年、年轻人、男人、女人，所有人的自尊心都遭到严重摧残，

然而战后竟然又恢复了自信心。

大屠杀的幸存者不久就会与世长辞，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观察、研究人类的忍耐限度及其恢复能力。人类需要旺盛的生命力来支撑。

当死神即将临近幸存者时，对我们生者来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来倾听他们的内心独白。

目 录

导 言	(1)
第 一 章 幸存者的不幸	(10)
第 二 章 谁之过?	(38)
第 三 章 无泪的祭奠	(59)
第 四 章 人性脆弱	(74)
第 五 章 面具	(92)
第 六 章 年轻的希望	(120)
第 七 章 无法忘却的记忆	(134)
第 八 章 危机家庭	(151)
第 九 章 上帝看到了吗?	(178)
第 十 章 血债血还	(203)
第十一章 集体的罪责	(222)
第十二章 我们记住什么?	(239)

导 言

我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为了写一本有关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孩子们的书，我查阅了许多背景材料，结果发现了很多关于战后幸存者自身心理调整的档案。我对有关幸存者心理健康的专业调查报告读得越多，就越强烈地感到震惊。虽然那些幸存者并不生活在我的周围，但我这样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的感觉就该因此而麻木吗？那些幸存者难道真的像有些作者竭力渲染的那样，沮丧、冷漠、不能再去爱甚至功能失调吗？

确实，大屠杀的幸存者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迫害。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曾经遭受过生理上和精神上打击的人们，他们所受的迫害已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残酷界限。那些无法弥补的严重摧残，使他们丧失了正常人所拥有的功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固定不变的图片无法对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精确的描绘，我后来的研究调查证明了这一观点。

这是一本有关恢复人类生存能力的书，是一本有关大屠杀的幸存者在被十分残酷地蹂躏之后，又重新唤起生命希望的书。从所提供的观察资料当中您会了解到，那些幸存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尽管他们经历了毫无自尊可言的青春期和成年期，但他们终究都能成功地恢复以往遭到损害的自尊。大

屠杀幸存者们不久就会与世长辞，现在是惟一的机会，可以对人类忍耐力的极限、人类坚持生存下去的能力和决心进行案例研究。随着幸存者的死亡率不断上升，也许这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有必要倾听他们对内心活动的描述。

这是一本关于个体而不是关于某种现象或综合病症的书，它揭示出一个多年与恐怖生活在一起的人，是如何避免感情麻木而顽强生活的。

这是一本描述人们如何经历对过去行为的困惑不解与彷徨不安的心理状态的书，正是这些困惑与不安使得他们对生存感到矛盾不堪。

这是一些极度痛苦的故事，因为它们直接来自那些被任意殴打、被剥夺了自由权利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尽管大屠杀幸存者似乎在外表上就像你和我一样，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备受折磨——消灭人的肉体要比消灭他的记忆力容易得多。

脆弱的感情可以传染。尽管没有直接遭受到第三帝国的迫害，但是，那些大屠杀中幸存者的孩子们却在其阴影下长大。正像一位第二代的人所说的：“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都在我出生之前就发生了。”听着恐怖的故事，感受着父母们的忧虑、愤怒和痛苦，想象着他们所受到的羞辱和折磨，慢慢地，在那些从未见过纳粹党卫军的孩子们心中，已被灌输了某种程度的不安。

1987年8月，我母亲让我和姐姐陪伴她去旅行，回到波兰，回到过去。我们在特雷布林卡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走访了许多地方。我逗留在犹太人踏上死亡之路的铁路旁，一想到过去的日日夜夜就忍不住地流泪。之后，我经历了这次旅行对我的心灵最有启发和震颤的时刻——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突

然感到有一股强大的磁力要我留下来，我也感到有义务留下来，来分担我的兄弟姐妹们遭受的苦难。

（在1993年的一次访谈中，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的副馆长克赖斯太纳·奥莱克斯讲述过，最近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与他联系，希望死后埋葬在伯克瑙，也就是巨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杀戮中心。是的，那些幸存者们都感到有义务留下来。）

马尔卡·莫斯科维茨^① 18岁时终于在卑尔根—贝尔森获得了自由。在其后的数年里，她的父母、两个兄弟和惟一的姐姐遇害的噩梦总是缠绕着她。正如她所描述的，随着第一个孩子于1948年的降生，才终于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像许多幸存者一样，时光的流逝和家庭的重建逐渐慰藉了马尔卡的创伤，“再也没有梦到过那些事情。”然而，就在我们安排会谈的头一天晚上，马尔卡不时地被梦中可怕的情景所惊醒。她回忆道：“盖世太保正在追赶我……所不同的是，这次我的孩子和孙子们也和我在一起。我们跑啊跑，我不停地喊着，尽量使自己坚强一些。我相信他们不会抓住我们。然而，当我们刚一转弯，却发现他们拿着枪，站在那里大声喊道：‘不许动！’我尖叫着：‘不！’然后就醒了。”这种持续不断的、脆弱的、下意识的情感明显地弥漫于战后她的家庭生活。

匈牙利出生的艾达·科克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达朝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过去一直隐瞒着自己在大屠杀中的经历。1946年，当传闻俄国人即将临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时，她决定跑到巴勒斯坦去。艾达回忆说：“当我来到以色列，就下决心忘记过去，再也不想那段日子，不谈论那些事情。我现在告诉你

^① 为了保护那些被采访者的隐私权，本书所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字都未用原名。

的，恐怕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孩子们。昨晚，我一直在考虑咱们之间的会谈，我不停地流泪，一切又都回来了。”仅仅是想到采访，就使艾达多年以来设立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戴维·希梅尔斯坦是一位 77 岁的老人，家住郊外。他身着羊绒毛衣和笔挺的华达呢裤子，同我热情握手。然后，把我领到客厅的桌旁。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一家豪华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他表现出特有的自信。然而，当他开始历数在大屠杀中的遭遇时，其社会角色逐渐消失。当讲到他和他的女儿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其社会角色完全消失了。戴维猛地站起来，边踱步边激动地说着，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们尖叫着：‘该死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分开了。”泪水顺着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他愈发激动起来，“他们从我这里夺走了我的女儿，把她推进妇女的行列。‘爸爸，别离开我！’女儿声嘶力竭地叫着。”戴维一下瘫倒在椅子上，把头埋在胳膊弯里抽泣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试图使自己镇定下来并自责地说：“我不想……哭……我从不其他人在面前哭……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感受。”

为什么这些幸存者同意接受采访呢？为什么他们又一次将自己带入到那痛苦的经历中呢？在无数次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极度矛盾地想：我有权力刺激那些受过惊吓的神经吗？在打电话与一些幸存者联系时，我了解到我的问题常常使他们夜不能寐，导致令人不安的后果。安娜·马利尼是一个比利时人，她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特里西恩斯塔特集中营极度恐惧。在我们会谈的 5 个小时里，她总是在哭泣。当她描述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明显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交织在里面。在那里，她被刮掉了身上所有的毛发，被迫裸体而立受

审，备尝羞辱。我问道：“您要不要休息一下？”她回答说：“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都活下来了，这算得了什么？”

这些幸存者想让世人了解真相。希蒙·纽曼通过把自己化装成为波兰人而活了下来。在把他的大屠杀经历隐藏了多年以后，他说：“在没有告诉别人过去发生的事情及我的感受之前，我还不想死。”他想让我们了解大屠杀给他留下的全部影响，而不是单纯在 1939 年至 1945 年发生的事情。索尔·范戈尔德告诉我：“说出这些是我的一种悼念方式，我要把这次采访献给所有惨遭杀害的人。”——当索尔一家人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其父母和怀孕的姐姐立即被送进了毒气室。

幸存者曾经向遇害者许过诺言。的确，对于许多人来说，生存下来，告诉世人他们所目睹的一切，已经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主要生存动力。哈里·戈德堡说：“这是我的责任，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原因。”大多数幸存者在获得自由之后，成功地重建起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经历了一种强烈的“向前进，不要回头”的冲动，这种面向未来的倾向并不意味着要忘记过去。相反，对我讲述一切是他们铭记过去的又一证明。

在我离开之前，安娜·马利尼坚持让我喝些咖啡，吃块蛋糕。吃完后，我把盘子放在厨房的水池里并感谢她：“您的谈话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这对您是很困难的。”她打断说：“你不明白，我很高兴有人愿意听这一切，关键是人们不愿意听。谢谢你想听这些，也谢谢你想写这些，这很有意义。”

从来没有人问过幸存者们的感受，也没有人问过他们现在的感觉。我们也许已经知道了大屠杀的事实甚至是细节，但是，我们却不了解这种持续不断的情感方面的影响。（尽管我们有时所了解的，只是幸存者的“幻觉”，但是我们也曾经看到过伊利·韦斯尔在大量的文献中的痛苦描述。）

心理医生、作家和艺术家都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大屠杀后的病理特征方面。他们几乎不承认也不相信蕴涵在幸存者中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使他们恢复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可以起到超常的作用。许多幸存者较少提及他们战后对身心的积极调整，关键的原因在于担心人们会否认他们身心创伤的严重程度。我们也许有必要强调幸存者战后的痛苦，从而不至于忽略他们过去所遭遇到的巨大的损失和无情的暴行。然而，为了理解幸存者，为了理解人类不甘心永远遭受压抑的顽强精神，我们也必须感激那些劫后余生的成功者。

为了这项工作，我采访了 58 位犹太幸存者。他们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丹麦、荷兰、法国、德国、南斯拉夫、比利时和奥地利 11 个国家。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落入第三帝国的魔掌的。现在，他们都生活在美国。其中有几位起初曾移民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在经历数年的艰苦劳动、生活设施匮乏以及因敌对状态而缺乏人身安全的日子后，最后都选择在美国过更舒适的生活。他们相信，他们都经历过非同寻常的苦难生活。

每次采访都是在幸存者家中进行的，平均持续 4 个小时。除了有 6 位是我在大屠杀纪念集会上初步结识之外，其他幸存者在我与他们联系以前都是素昧平生。然而，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我和我最新写的书——《大屠杀的阴影：第二代》。

在我接触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拒绝了我的采访。他们反复强调：“我想把所有这一切都埋葬掉。”一位女士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中断了与我的谈话。有些人以前从未提起过经历大屠杀的往事。一些人已经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提供过证明。从未有人参与过像这样对其难以治愈的战争后遗症的非治疗性的调查，而这些后遗症恰恰是他们以前所经受的不幸造

成的。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大屠杀的经历牢牢地铭记在他们心中。这是必须要流传于后世并且要刻骨铭记的：无论现在有任何困难，它们都无法与大屠杀相比。此外，它已经发生，谁对它也无能为力。人们只能拾起这些碎片，继续前行。

尽管我采访的重点是幸存者们的战后的生活，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让他们简要地向我描述其在大屠杀中的情形。我不仅想了解他们调整自身的情况，而且也想让他们触及到那些至关重要的岁月，因为那些事件使后来的生活更加不同寻常。我很清楚，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也许会揭示出在大屠杀期间的某些因素或经历以及它对幸存者战后心理的影响。

当看到这些苦难档案时，我真是悲愤交加，有好几次我都在考虑是否继续这个课题。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我是在父母的谆谆教导下长大的，他们希望我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免造成更深的痛苦。“我经历的不幸太多了，你怎么能再让我失望呢？”也许正是这些无意识的话语，周期性地妨碍我作一些决定。

当看到年长的、原本精力充沛的男人和女人哭泣时，真让人坐立不安。虽然他们都已为人父母，而且他们具备保护我们的舐犊本能，但是，我却不得不为他们的脆弱而感到震惊。更值得注意的是，我父母与其他幸存者们不仅在经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感情上也是如此。他们讲话带着口音，手势很相似。

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更多地知晓他们的过去，以加深对自己家庭及其他成员的了解。我知道的事实和真相越多，就越能掌握杀害我祖父母、姑姑、叔叔以及其他亲人的详细情况。

所以，我想收集他们的故事并了解其后果。因为采访时间有限，我每次都在为听到更多的事实真相而耐心地等待，同时也不得不压抑住急迫的心情。其中有一点令我深信不疑，那就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关于过去岁月的生与死的个人回忆，但我还是好像从来就没够似的，也许 600 万个受害者就应当有 600 万个故事。对于那些没有生还的人，他们同样也值得让世人了解。在弗洛森伯格 12 月份的严寒中，失去自由的人们是如何被强迫站成一行，剥得赤身裸体，被水龙头喷射。就在那次“点名”中，有 100 多人被活活冻死。

在某犹太人隔离区，有一个大约 4 岁的小孩，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甚至纳粹分子也愿意和她说话。一天她自己在路上走着，一个纳粹分子问她想吃块糖，‘闭上你的眼睛张开嘴巴！’然后他就朝她的嘴里开了枪。

因为我们远离事件本身，因为记叙文字太缺乏想象力，与人们的真实感觉相差太远，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材料一定是经过润色加工的，至少具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会变得不真实，或会变成抽象的数字。

对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多数人来讲，这场大屠杀已经是一段遥远的历史片段。但是，对于幸存者来讲，大屠杀却是昨天……和今天。

1989 年春天，我应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邀请，作为访问教授，讲授《大屠杀的心理历史学》。可想而知，我遇到了来自德国大学生的阻力。他们是来听我的关于历史和种族的“最终解决”方面的讲座的。然而，有一天当我讲到幸存者战后生

活时，我感到了一种情绪的变化，一种强烈的关心，一种由衷的同情。事实上，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在 1945 年结束，而这一观念对于那些学生来说却是全新的。这是一种当代现象，这种现象是与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并存的。顺便说一下，临近学期末，学校负责教学管理的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转年春天再来讲授这门课程，并且它有可能成为每年的必修课。然而，在此期间，作为惩罚纳粹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了。当我准备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时候，歌德大学突然表现出对此课程缺乏兴趣，借口是财政困难。重新统一为德国人提供了更深远的动力，要求对那段历史缄口不言。

幸存者们绝望了。安娜·马利尼悲哀地说：“我很愿意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因为人们都不相信它。……人们都不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安娜和她同命运的人们非常担心世人忘记或者歪曲大屠杀。安娜理解人们想忘却并远离那些令人恐惧的回忆，但她也敏锐地觉察到，她和那些与她有同样经历的人终会与世长辞，到那时，再也没有目击者能够确切地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许多幸存者也对能有机会敞开心扉而感到由衷的慰藉，感到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激发人们共同的善恶观念。

“我从未谈论过它，但现在我告诉你，就如同告诉了全世界。”

第一章 幸存者的不幸

在对大屠杀做出结论后的数十年里，几乎再也没有有关文章。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里，人们却目睹了各式各样的素材，有大量的历史记录、个人回忆录以及描写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生与死的小说。但是，却极少有人注意到战争的创伤所带来的影响。60 年代末期，来自医疗诊所的报告揭示出大屠杀对幸存者在心理上的创伤。一些幸存者，例如琼·艾默里，就意味着深长地写出了幸存者的人格已疏远于社会，他们继续感觉到自己仍然是“不同的人”^①。15 年后，人们把注意力转到幸存者的孩子们身上。人们想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究竟对孩子们造成了什么影响，对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作用。许多提出这些问题的研究人员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近年来，在二战期间还是小孩子的幸存者们已经认识到，其特殊的成长阶段及经历对自己具有独特的影响。

心理医生和有关人士常常把大屠杀幸存者，特别是犹太人幸存者看作是一种单一的现象。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的犹太人的经历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有些犹太人把大部分

^① 琼·艾默里：《心灵的界限》，纽约，斯克克肯出版社，1986 年。